

#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现实语境与当代价值

张水华, 查明辉

(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根基,借鉴了列宁和平共处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承继了新中国国际战略理念和政策主张。它的提出和践行,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面临严峻问题与挑战、中华民族处于伟大复兴战略期的必然要求。它为推动国际秩序和治理体系的变革、拓展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途径以及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论基础; 现实语境;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21)02-0035-08

## The Theoretical Basis, Practical Context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Though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ZHANG Shuihua, ZHA Minghui

(School of Marx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Tak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drawing lessons from Lenin'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inheriting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ideas and policy propositions of New China, the though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inevitably required, it has been put forward and put into practice at a time when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human society is facing sever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Chinese nation is in the strategic period of great rejuvenation. It has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governance system, to the expansion of way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a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oretical basis; practical context; contemporary value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

收稿日期: 2020-12-05

基金项目: 江西师范大学科研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科学内涵与时代价值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政府主导型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模式研究”(编号: 18BKS124)

作者简介: 张水华(1978-),女,江西萍乡人,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查明辉(1974-),男,江西浮梁人,博士,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应用社会学。

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近年来学界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来源、时代背景、科学内涵、价值意蕴以及实践方略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仍将不断深化发展,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仍有较大可拓展的空间。本文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现实语境和当代价值展开进一步分析,揭示其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以利于更好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使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丰富与发展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南,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思想为其产生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经验启示,新中国国际战略理念和政策主张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

### (一) 理论根基: 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揭示了在人类历史由民族史向世界历史演变过程中人类共同体的演进历程、特点及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生产力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依据这一规律,人类社会经历从“自然共同体”到“虚幻共同体”再到“真正共同体”的演变发展过程。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使人类不得不以自然共同体形式生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共同体在原始社会末期趋于瓦解。此后分工的发展,产生了个体或家庭的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于是共同利益以国家的姿态采取一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sup>[1] 3( p163-164)</sup>。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国家政权始终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并且始终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因此,这样的国家绝不是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利益的代表,而只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它不但不能为其成员提供真正自由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成为个人自由发展的限制。在马克思看来,“他们应当推翻国家”,才能“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sup>[1] 3( p201)</sup>。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解构虚幻共同体的同时,指出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从人作为类存在的角度出发,高度抽象出人的生命及生存本质,将个体发展和共同体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到了“真正共同体”社会,个体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sup>[2] 3( p53)</sup>。那么,何时才能实现“真正共同体”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是前提条件,所有人解放的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sup>[1] 3( p169)</sup>。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个人也将从孤立的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向世界历史性的个人转变,而只有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被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所代替,个体的人或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人类进入“真正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以整体性视野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和规律,揭示出人类建立真正共同体的必然和可能,并指明了“真正共同体”的价值旨归。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人类社会的整体视域出发,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今世界治理体系以及人类社会面临的现实挑战进行认真审视,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全球化深入发展使“历史”不断向“世界历史”转变,但当前的全球化与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世界历史”还存在很大差距。马克思视野中的“世界历史”,意味着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民族国家消亡,资本主义缺陷被克服,人类实现自由自觉的本质的复归。而当前由资本驱动的全球化还不能完全克服马克思当年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基于此,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因素,并旨在逐步克服资本主义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关系,推动人类解放的进程,使整个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真正共同体”。因此,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并非马克思所设想的“真正共同体”,但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点,是全人类从“虚幻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迈进的一个过渡阶段。

## (二) 经验启示: 列宁和平共处理论与实践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成为现实。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随即面临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关系的问题,对此,列宁提出和平共处理论,阐述了两不同社会制度进行相互交流与利用以促进共同发展的可能性、现实性。

在政治关系方面,列宁强调要坚持和平外交的总原则,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尤其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在经济方面,主张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 +=总和=社会主义”<sup>[3] (p520)</sup>。在他看来,新生社会制度取得胜利最重要、最主要的就是提高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为此,他提出了借鉴美国的管理制度、向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学习等具体措施。他还注重发展对外贸易,把对外贸易与国内经济建设统一起来。在文化和民主方面,列宁主张将文化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甚至优先发展的地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他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sup>[4] (p168)</sup>。他认为经济、文化和民主三者辩证统一,文化事业的发展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只有经济得到发展,文化事业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有所发展。

列宁以全新的视野,全面系统分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思想,深刻揭示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不仅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制度性质的国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提供了现实的经验启示。

## (三) 思想来源: 新中国国际战略理念和政策主张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全人类解放、每个人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终极使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关心全人类的共同命运,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理念、建立国际新秩序观、和谐世界等系列国际战略思想和政策主张<sup>[5]</sup>,这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直接来源。

第一,和平发展理念。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繁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建设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围绕如何开展国内建设、如何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处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1953年12月,周恩来首次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sup>[6] (p63)</sup>。1955年4月,万隆会议提出“十项原则”,其中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将独立自主与相互合作有机结合,成为新中国处理外交关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奠定了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根基。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一方面强调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sup>[7] (p3)</sup>,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不结盟和不干涉别国内政。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继续践行和平发展的思想,提出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主张。进入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社会鼓噪的“中国威胁论”,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sup>[8]</sup>。中国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宗旨,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致力于建设一种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

第二,国际新秩序观。20世纪80年代,国际局势总体相对缓和,但当时国际旧秩序对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与破坏作用,建立国际新秩序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心声。1988年12月,邓小平在与印度总理甘地会谈时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sup>[7] (p282)</sup>。他反复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指导建立国际新秩序,视它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sup>[7] (p96)</sup>。21世纪初,江泽民进一步发展了国际新秩序观,提出“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sup>[9] (p566)</sup>。他强调要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sup>[9] (p110)</sup>。为此,他积极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各国应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这一进

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为前提基础,以共商共建、共担责任为行动方式,以共赢共享为价值旨归,蕴含着国际新秩序观,是对国际新秩序观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和谐世界理念。21世纪初,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为构建和谐世界创造了机遇。同时,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影响各国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为应对全球发展遇到的难题,2005年4月,胡锦涛从全球的视野提出“和谐世界”的倡议,号召共建“和谐世界”<sup>[10]</sup>。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构想,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sup>[11] (p350-356)</sup>。和谐世界理念体现了中国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与高度责任感。它所蕴含的国际政治观、全球经济观等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主体框架。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现实语境

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sup>[12]</sup>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中华民族处于伟大复兴战略期的现实语境中产生和践行,是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呼唤。

### (一)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今时代呈现出新的特征,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产生成为必然。

第一,世界多极化不断发展重塑世界格局。自两极格局终结以来,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逐渐崛起,按汇率法计算,目前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比例接近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sup>[13] (p445)</sup>。而西方国家整体实力出现下滑,二者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国际力量的对比逐渐趋于平衡。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历史性的甚至是难以逆转的变化<sup>[14]</sup>。它使整个世界权力格局朝着更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方向演进。国际关系日趋民主化、扁平化,为世界各国进行更平等的交往合作提供了政治保障,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可能。

第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亟须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理念的变革。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促使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和优化配置;同时它也极易导致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扩大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使金融风险和资源危机更加严重<sup>[15]</sup>。因此,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应当共同承担的重任。这既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全球化规则机制,也需要树立一种新的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的中国智慧和方案<sup>[16]</sup>。

第三,新一轮科技革命持续推进带来机遇和挑战。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了密集的活跃期。以信息、生物、新材料以及新能源技术等多个科技领域相互交叉融合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既可能为世界经济发展、世界和平、各国文化交流传播以及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等提供动力,也很可能带来潜在的威胁。人类应该共享现代科技文明的成果,而不是被自己创造的文明成果所毁灭。新一轮科技革命持续推进,使人类共同利益更加高度融合。构建一种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民主透明、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众多国家日益强烈的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是对这一诉求的积极回应。

第四,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要求人类树立一种新的文明观。当前,伴随经济全球化,各种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不同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各种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文化文明发展的现实。人类的历史昭示出:冲突和战争往往肇始于误解与偏见,而发展和繁荣则受益于交流与互鉴。承认并尊重文化多样性,成为众多国家普遍接受的国际准则。然而,由于“中心—边缘”体系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全球文化交流不对称问题依然严重。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要求人类尊重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sup>[17]</sup>。国际社会必须走出昔日一些西方国家奉行的“霸权文明”的老路,进而走向包容文明或者共生文明的新路<sup>[18]</sup>。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美美与共、和谐共生,蕴含着一种新的文明观,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 (二) 人类社会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

当今世界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日益严峻复杂,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人类不得不思考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政治安全领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盛行,某些国家宣扬“人权高于主权”“新干涉主义”等论调,采取打压异己、干预别国内政、军事扩张主义等行径,严重威胁世界和平;国际上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依然存在。他们极力挑动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分歧对立,把世界置于分裂和对抗的危险境地,严重影响人类社会的安全稳定。

经济领域,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甚至严重衰退等问题依然存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明显。有的西方大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严重冲击现有多边经贸治理机制,严重阻碍全球经济发展。加上当前全球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各项宏观经济指标恶化,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衰退期。联合国2021年1月的一份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4.3%,而疫情预示着全球复苏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sup>[19]</sup>。若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将给国际政治稳定带来破坏性影响。

生态环境领域,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使全世界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环境问题。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对地球生物产生了严重危害,给人类正常生产生活带来不良影响。水资源缺乏、水体污染、土地荒漠化以及垃圾废弃物处理等问题,都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环境问题的弥散性、跨国性及严峻性,客观上要求国际社会实施“全球环境治理”,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sup>[20]</sup>。

此外,人类社会还面临着粮食安全<sup>[21]</sup>、网络空间安全<sup>[22]</sup>、公共卫生安全等危及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与挑战。2019年底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充分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都极易成为世界性问题,无论哪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各国“要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站在全人类高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sup>[23]</sup>。

## (三) 中华民族处于伟大复兴战略期

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sup>[13] (p77)</sup>。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梦想。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的战略期。

从国内来看,经过不断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当前,我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开启了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中国从未如此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我国还面临着不少因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引发的困难和挑战,区域发展、收入分配、民生保障等领域还存在诸多问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任重道远。

从国际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风险。全球范围的合作交流将更加密切,不确定性也与日俱增,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将更加复杂,国家安全将面临更多挑战。早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就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sup>[24] (p200)</sup>。

面对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而中华民族又处于伟大复兴战略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统一起来,深刻思考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前途命运,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抓住机遇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同时又通过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促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当代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产生和践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不仅有助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而且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

#### (一) 推动国际秩序和治理体系的变革

良好的国际秩序和治理体系关系着全世界人民的福祉。当今的国际秩序和治理体系依然以西方大国为中心,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呈现出鲜明的霸权主义色彩。这种国际秩序和治理体系显然滞后于当今世界的变化。国际社会需要全新的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和治理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顺应当代历史潮流的产物,蕴含着构建国际新秩序的中国构想,既充分表达了中国致力于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良好愿望,又契合了构建国际新秩序的需要。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指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经过几百年的努力,已积累了一系列世人公认的国际关系原则。这些原则应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sup>[25]</sup>(p416)。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着眼于整个人类的进步,主张超越国家、民族之间的隔阂与纷争,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新秩序,反映了各国各民族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助力推动国际新秩序的重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克服了西方治理理论的缺陷,有助于促进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的变革。西方现行全球治理理论建立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基础之上,以西方国家为核心,体现的是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价值判断标准。以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这两种典型的西方全球治理理论为例:国家主义主张以国家为中心,偏袒民族国家的绝对主权,容易造成对内专制集权,对外霸权冲突,形成单边主义;世界主义主张以世界为中心,超越主权国家的权威,强调世界公民身份的属性,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普世价值至上化,倡导世界政府,具有浓厚的一厢情愿色彩。不同于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摒弃了原有治理模式存在的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sup>[26]</sup>。它既描绘了跨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治理愿景,又承认当前各民族国家的正当利益,表明中国政府愿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诚意与决心,契合了全球治理的时代需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质是一种新型全球治理观,其核心是合作共赢,其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其目标是要变革全球治理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它是对当代西方全球治理理论的扬弃与创新,不仅丰富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内涵,而且指明了世界各国共同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新方向。

#### (二) 拓展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途径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采取什么样的道路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都极其重视的问题。在近代历史上,欧美西方国家先后踏上资本主义道路,且逐渐形成资本主义的全球网络,而俄国、中国等相对落后的国家则在20世纪先后开启了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苏联社会主义建立后,一系列新兴发展中国家便面临着资本主义与苏联模式两条道路的选择。

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创造物质财富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发展缓慢、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动荡等问题,以致有的发展中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后,虽然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初步繁荣,但并未真正摆脱贫困。苏联模式存在政治上高度集中、经济形式单一等诸多弊端,战后部分东欧国家追随苏联,但没能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科学设计自身发展的目标、模式及政策等,不幸在东欧剧变中瓦解了自身原有的发展基础。进入21世纪,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该何去何从以实现本国现代化发展的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启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其间虽有曲折,但最终找到了适合自身自主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和中国社会个性紧密结合,注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领域全面发展,力求避免以往现代化出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严重扭曲、各种社会公害的普遍流行”<sup>[27]</sup>(p40)等问题,体现出其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苏联模式的超越。正因如此,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焕发出蓬勃生机。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都正处于“发展”中,面临相同的时代境遇和相似的国内问题,具有许多共同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方案,凝聚了中国在与世界共同发展过程中逐渐摸索出来的经验总结。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从某种角度上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解决当前出现的世界性难题,并力推一种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型的全球化而提出来的”<sup>[28]</sup>。

### (三) 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贡献

首先,增强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人类文明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精神的、历史的基础<sup>[2] 199</sup>。它揭示出经济在人类文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实践,能够促进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一带一路”倡议,连接亚欧的古代丝绸之路,并且加入连接亚洲与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积极发展广泛的经济、文化和科技等领域的全球性交流合作平台,促进中国与沿线各地之间的物质、资本、人员的流动,积极帮助沿线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经济成果,对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强有力的拉动和推进作用。

其次,彰显人类文明发展的丰富性。长期以来,人类文明的话语体系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西方中心主义”论调占据了很大市场,福山“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即是这种论调的典型代表。“历史终结论”早已破产,而亨氏的文明冲突论倾向于从“你强我弱,此优彼劣”的二元对立角度来对待世界文明,忽略了人类文明有交流互鉴、和谐共存的可能,背离了当今世界时代发展的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着一种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新型文明观。习近平曾指出,各种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和包容的。只要秉持包容精神,便不存在“文明冲突”,就可实现文明和谐<sup>[24] 176-78</sup>。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摒弃了一切狭隘民族主义和个体中心主义,体现了一种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相互尊重、交流互鉴的新型文明观,符合时代发展趋势,也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指出了一条阳关大道,人类文明的丰富性也得以充分彰显。

再次,为人类文明应对挑战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当前人类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而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和理念的缺陷,导致人类在这些问题面前有时束手无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出路。例如,在政治安全领域,针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现象,它主张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坚持走对话、结伴的国际新路,主张大家的事情应由大家商量着办;针对恐怖袭击、跨境犯罪、网络空间等安全问题,它倡导国际社会致力于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国际安全。在经济领域,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它倡导加强协调和完善治理,推动建设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在生态领域,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各个国家共同行动,保护自然,爱惜环境,践行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呼吁全世界一起呵护地球家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涵盖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等多个领域的总体布局,对当代世界所面临的亟须解决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以及非传统安全等问题作出了积极回应,贡献出中国方案与智慧<sup>[29]</sup>。

## 结语

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发展全球一体化趋势愈加明显,世界各国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与依存的共同体。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与挑战也日益繁多,尤其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场,顺应了全球一体化的共同发展浪潮及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需要。它作为由中国提出的、具有开创性的理论,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载入了中国宪法及联合国的多份文件中。各国各民族都应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摒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藩篱,携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

##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4]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5]吴志成,吴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3):16-18.
-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8]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3-21(2).
- [9]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0]胡锦涛.与时俱进 继往开来 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N].人民日报,2005-04-23(1).
- [11]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4]高祖贵.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N].学习时报,2019-01-21(1).
- [15]孙德超,周媛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困境与路径选择[J].行政论坛,2019(4):89.
- [16]张雷声.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12):33.
- [17]赵永帅,秦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自知、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为[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24-27.
- [18]郭树勇,丁伟航.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内涵与治理逻辑[J].社会科学,2019(10):14.
- [19]杨海泉.全球经济今年将反弹4.7%[N].经济日报,2021-01-27(4).
- [20]高立伟,贺剑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矫正全球治理失灵的智慧良方[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3-9.
- [21]李秀香,和聪贤.我国粮食安全水平评估与对策[J].江西社会科学,2020(11):14.
- [22]刘明奎.网络技术治理主义批判与概念重构[J].江西社会科学,2020(9):18-19.
- [23]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N].人民日报,2020-09-24(1).
- [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25]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26]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4):9-12.
- [27]吴波.社会主义与中国道路[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 [28]胡江华,钟瑞添.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江淮论坛,2020(4):76.
- [29]冯霞,黄晓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意蕴——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论证[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16-17.

(责任编辑:郭荣华)